

译介之旅

怀念

译事:作为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

黄 荭

有些人,永远不会离去 ——纪念叶涓渠先生

高 兴



自 我

学习很重要,做自己也很重要。周国平在《拥有自我》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世上有过无数片叶子,还会有无数片叶子,尽管一切叶子都将凋落,我仍然要抽出自己的绿芽。”这也是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在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阅读成就了经典。同时的确存在人与他所读的书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融入了自己的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享受阅读吧,因为它让你在似是而非、非你非我的过程中发现事物的本真。

“阅读是呼吸,翻译就是如鱼饮水,知道冷暖,我饮了别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便也有了我的温度。”鱼儿喝了一口水再吐出来,虽然这口水又复归于河海,但它有了你的温度。我觉得任何翻译都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是译者给予的。很多人在研究时往往忽视译者的存在,我也是在学了外语、做了翻译后,才知晓翻译的甘苦,才会去关注译者,好的译者会成全一本书和读者,而糟糕的译者对一本好书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

遇 见

翻译虽是一件寂寞的事情,但是翻译活动却促成了很多“遇见”,遇见是我的书《转身,相遇》的主题,也是我对文学、对待人生的一贯态度,是一种在路上的心情和期许。翻译虽然孤独,但是在孤独中却可以伸出很多触角,接触到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人建立联系。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很短,意味却深长。在人生不同时期,我们承担的角色不同,有时一人分饰多角也不一定。小时候希望自己是桥上观风景的人;长大后含蓄了,更喜欢躲在楼上偷看;现在的想法更朴素,觉得能做一座桥,一扇窗就很好,可以让你遇见他(她),可以让你(她)看见你。译者的身份更像一座桥或一扇窗,而桥和窗自身也可以是一道风景。

梁宗岱、徐志摩、梁实秋、鲁迅、茅盾、施蛰存等老一辈翻译家,在译译外国文学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成就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过渡的新文化运动。现在有些译者把自己的地位降低了,认为作者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译者就要亦步亦趋,低到尘土里。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好的翻译文本是译者和作者的一种神交,一种共鸣,一种合拍。梁宗岱先生在面对罗曼·罗兰、梵乐希这样的大家时,一直都用平等对话的姿态来与之交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译过很多作家的作品,女作家有柯莱特、杜拉斯、萨冈、波伏瓦、内米洛夫斯基、萨勒娜美、班科尔……男作家像罗曼·罗兰、勒内·夏尔、圣埃克絮佩里、菲利普·福雷……在南京先锋书店做《转身,相遇》新书读者分享会时,嘉宾周宪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译女作家的作品要比译男作家的作品好,又说我译坏女人的作品比译好女人的作品好。我当时被逗乐了,反问他好女人和坏女人的界线在哪里。我也把自己翻译的女作家分两类:一类极具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未脱小孩子心性,更符合我的性格;而另一类则是理性的,用法国的说法是“长了男人的脑袋”,擅长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像波伏瓦和萨勒娜美,我在翻译时就有点小畏惧。这也说明翻译有很强的选择性,聪明的办法就是扬长避短。但我也后悔翻译了自己不擅长的作品,因为这些原本在阅读视野之外的作品,因为翻译的机缘进入视线,它呈现的是另一个陌生而丰盈的世界,比如萨勒娜美的《战斗的海狸》让我更了解波伏瓦,从而更了解女人的生存境遇,从某种意义上更了解作为(成为)女人的自己。

选 择

梁宗岱先生曾说,一件艺术品是“想做”、“能做”和“应做”之间一种深刻的契合。之所以“想做”,是因为文本吸引你,它跟你是契合的,有共鸣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音乐,如果要译的文本跟内心的小音乐合拍,翻译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如果不合拍,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所以在翻译前要先研读文本,也是要找到调子或风格——原文的风格和译者可以呈现的译文风格。

但有时候想做的不见得就是力所能及的,有些文本很美,你懂得欣赏,但真正操刀去翻译却有心无力。所以翻译前要先判断是不是“能做”,不能做就诚实地表示自己做不了,要负责严谨。“应做”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是站在本国的文化立场上去选择,去“拿来”,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费正清的老前辈就是特别有历史使命感的文人。

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没想过要从事文学创作。后来他女儿查出来患了胃癌,4岁就去世了,他开始写作《永恒的孩子》以及之后的《纸上的精灵》。我翻译的《然而》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他一直没有从丧女之恸中复原,希望通过别处的风景去冲淡这份无

法慰藉的哀伤,《然而》就是他和诗人小林一茶、小说家夏目漱石和摄影师川端康成的“相遇”。这个文本之所以特别打动我,一是死亡一直是引我沉思的主题,其次是文本弥漫出来的诗意和这种诗意对翻译提出的挑战让我着迷。我在中学时代写诗,上大学后被法语苦苦摧残,弄得诗意全失。留校做老师的头两年,生活仿佛又放慢了脚步,于是整理了一些旧时涂鸦,也译了几首勒内·夏尔的诗歌。但译诗很难,我就很快就放弃了。翻译《然而》让我觉得又回归了以前的自己,回到过去对诗歌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翻译是遇见也是重逢,你遇见了一个合拍的外国作家,同时也重逢了或已失落的自己。当我把小林一茶的俳句从法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也享受了阔别已久的写诗的乐趣。“是的,一切皆空 / 过客,烟云,寂静 / 诗云”。

如果译者对文本没有感情,它没有吸引你,打动你,那么文本经过译者翻译出来也很难打动别人。译者要投入感情,译出来作品才会有感染力,《然而》整本书都萦绕着一抹色彩。这种色彩特别契合我翻译时的心境,稍有点年华老去的感觉。

爱 情

有时候是因为作品而想去认识作家,有时候是因为作家而想去阅读他更多的作品。这种文学的相遇很多人都曾用不同的譬喻来形容。许约说翻译是一场艳遇,被毕飞宇引用后变得非常有名。“艳遇”或许更多是男性语汇,有猎奇、偷欢的意味,我更喜欢袁筱一的说法,她认为翻译和爱一样,是最难的事,但虽然难,却不能不做。爱情给人的感觉似乎更执著,更投入,也更细腻吧。

把翻译比作爱情的确很贴切,有些文本令人一见钟情,如《小王子》《玫瑰的回忆》《花事》《然而》,我对它们一就倾心。但也有一些文本令人日久生情,书是别人介绍的,就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一开始不见得对上眼,但朝夕相处下来,慢慢体会到文字的好,慢慢有了感情有了依恋,比如杜拉斯、波伏瓦、萨勒娜美。

也有一些作家会在人生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跟你多次重逢。对于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拉斯,我1997年翻译《外面的世界II》之后做关于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外面的世界》是杜拉斯写给报纸杂志的文章集子,很芜杂,所以翻译前和翻译时要查很多背景资料,请教很多人,文字的愉悦在某种程度上被繁复的资料查证冲淡了,当时只觉得翻译很难,南京的夏天又特别闷热,难免有一点焦躁的情绪在里头。《外面的世界》并不是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不过因为翻译它,我阅读了杜拉斯很多作品,做了一些研究,所以译完我对她已颇为了解,可以说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几扇窗,因为她的领域宽泛,涉及戏剧、电影、政治、音乐……我喜欢杜拉斯是因为她给了我想要的触角,经由她可以接触到各个领域和不同的人。

复 译

复译文学经典跟初译作品感觉不同。我复译的作品不多,有《小王子》和《人类的大地》,因为圣埃克絮佩里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所以当出版社找我重译《小王子》时,我开心得不行,一个非朝孩子气的梦圆了;我只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在暗夜里,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说给自己听。英文译者孙仲旭也谈到:“喜欢到了极点,就有这样的感觉:‘我要咬你口才过瘾!’我的咬法,便是重新译一遍。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家,以后有机会时,或者仍不会拒绝。”成熟的译者,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还是希望跟文本有一段情缘,这是译者的“力比多”。很多经典作品在复译中有了新生命,但如果出于追求某种商业利益,宣扬自己做出了一个最好的译本,其他译本都错误百出云云,这种态度是特别危险、特别要不得的。复译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读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是一定的;但是过多的扎堆复译还是有点浪费资源。

说到翻译态度,法语界很多老翻译家都值得学习。罗新璋老师曾很尖锐地指出了我行文的缺点,他说年轻一代都有这个通病,老一輩翻译家有古文功底,遣词造句简洁凝练,罗老师的《红与黑》译好后校稿时删去了3万字,而现在年轻译者的毛病就是“的不不休”,一句话好几个“的”,显得句子拖沓啰唆。对作家、对译者而言,“节省语言是基本的美德。要养成一种洁癖,看见一个多余的字就觉得难受”。又比如周克希先生谦称自己几十年翻译的经验 and 感悟只是从生在译文日的杂草,他在《译边草》的后记说翻译“只因为热爱”,而这热爱和坚持最难能可贵。

一个好的译者、好的作家也一样,不追求著作等身,而是把心思花在质上,在“精”上做文章。梁宗岱先生有个说法:好译文是改出来的。做翻译是在寂寞中成就文字的圆融,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信中说:“你要爱你的寂寞。”因为心灵是在寂寞中成长的。

“译事无成”,这是南桥一篇文章的题目,或许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如此,但在我们,译事最大的收获是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认识并成为了自己。

译 文

终于所有的回忆都淡忘了,之后留下了一个个梦。既然从此只剩下梦,我们便把生活的烦恼托付给它。

很快,我将回想不起所有的一切,一切除了这个我每晚一睡下就会回来的故事。它成了我最清晰最古老的回忆,那或许可以追溯到它四五岁的时候。夜降临了,房间的黑暗越来越厚重,我闭上眼睛,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我离开了房子。我踏上上学的路,或者是通往花园的路。一切都很冷清。巨大的、神奇的静谧停歇在世界之上。在白天殆尽,暮色苍茫中,我走了很久很久,但一点也不累。我享受着这份极度的轻盈和我走过身边万物时的从容。我穿过城市:楼房灰色的门面给人一种迷失在天空的印象,巨大的楼梯旋转着通向虚空,就像沾染了辉煌宫殿的幻影。远处,依稀是铁青色的运河,水池和泉水静静地为它供水,运河的深处倒映着一座座巨大的拱桥。

太阳还在照耀,但已经照不见影子也没什么热度了。我小心地不走出我的街区的边界,但街区变得很大,大得可以容下世界无法想象的全部空间。什么也没有。我丝毫认不出周围的一切。我一直向前走,越发深入一个寂静而无休止的仙境中心。我发现的新景象越发滋长了我的困惑。我无法指出家的方

向。我明白自己是到了世界真正的尽头,而在那里,一无所有。永远我都找不到归途了。

我彻底迷路了。在梦中,我知道无边的忧愁、无底的绝望在那一时刻一定会狠狠地折磨我。我权衡着自己作为迷路孩子的悲惨境遇,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有一份巨大的宁静栖息在我身上。我感到自由,这份忧伤的自由在我就像是一种我不想舍弃的眩晕感,多亏了它,我听任自己带着感恩之心,从容、快乐地迷失。

整个梦境都沉浸在同一种颜色里,但奇怪的是这一颜色,这种颜色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可能它和某种“黄色”相仿。而且,我根本无法准确地去说明它,更不能去描绘它。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质地?)着色?非常难以捕捉的特点,不易觉察地表现出所有色差,绿色、灰色、蓝色、红色,并不是一种颜色接一种颜色地交替更迭——绿色依然是绿色,蓝色依然是蓝色,等等——而是赋予它们一种相同的、模糊的虚幻神采。或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光泽,一种固有的、特别的、闪烁的韵味,而不是一种颜色,就像这个梦的世界所固有的飘忽的磷火,把世界包裹在它那一抹深海的、沉寂的透明里。

——黄荭译菲利普·福雷《然而》

黄荭,生于1973年,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主要译作有《梦》《外面的世界II》《玫瑰的回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然而》《解读杜拉斯》《爱如何降临》《对面的疯子》《秋之蝇》《战斗的海狸》等。

语 言

说到翻译,首先绕不过去的话题是语言。歌德说过:“谁不懂外国的语言,谁就不懂本国的语言。”我们打小说汉语,不会去深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当学习了一门外语,有意识地去了解语言的构成和特色,有了对比分析,有了距离,可以退开一步,回望熟悉到已经忘记它存在的母语时,或许才能看清楚其中的真意。陶潜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到了忘言的地步才是最高的境界——“妙不可言”、“不可言传”的诗意,还有语言和语言之间转化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翻译中的不可能性往往承载了更多的诗意。

语言是一个渡口,学习外语就是从此万水千山,漂洋过海,看见别处的花,遇见别处的人,读到别处的书,经过别处的风景,被他山的石头路疼了脚,被他山的饭菜吃坏了肠胃……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就是“水土不服”,而“人文教化”说白了就是放下自我,入乡随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他乡来确认故乡的模样,需要别处的生活来印证此处的生活,印证我们自己作出的一种选择。

再说到文学和生活,其实,从小时候懵懵懂懂背古诗开始,文学、诗歌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到生活,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是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艺术品位。因此,文学生活,或者说文艺并不是小资情调,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文学就像另一个维度的真实,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和领悟往往超过了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梵乐希在《幻美的末章》《棕榈》一诗中很好地诠释了人生和艺术的关系,梁宗岱先生译得也好:“忍耐着呀,忍耐着呀,在青天里忍耐着呀!每刹那的沉默,便是每个果熟的机会!意外的喜遇终要来的:一只白鸽,一阵微风,一个轻倚的少妇,一切最微弱的摇撼,都可以助这令人欣然跪下的甘露沛然下降!”人生和艺术都是漫长的修行:起初的忍耐是一种积累,在寂静中慢慢等待,等待果实成熟,等待让你惊喜的相遇,等待心灵与心灵的投契。最后艺术家欣然跪下,是对自然、对缪斯、对神的感恩。

翻 书

我的生活很简单,无事花草,闲来翻书。我的经历也不再简单,读书、译书、教书、写书。我知道自己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读者,学了法语后,翻书于我,多半就有了双重的含义,是随手翻,也常常是随手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阅读经验定格了我对人、对事、对生活的看法,而我居然也在别人的故事和文字里听到了自己心底的“回声”。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回声”(Echo),一个跟在作者身后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读者;作者创造,我再创造;作者思想,我再思想;自以为是我“我注六经”,殊不知懵懂里是“六经注我”。我的三本书《经过》《闲来翻书》《转身,相遇》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翻译的副产品。有朋友跟我说过:“时间就像中药,有疗效,但很慢很慢。”我觉得阅读、翻译和写作也一样,都是一种慢慢的滋养,在漫长的历练中渐渐化蛹成蝶。我知道自己自始至终爱上的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消遣”,虽然手里抓着的是青春的尾巴,我仍然愿意“用一朵花开的时间”,去邂逅一本书的浪漫。

“闲来翻书”也是我对翻译的态度。我们处在一个求快的消费时代,但读书、翻译、做学问是需要真正静下心来,需要有“闲工夫”去慢慢做。除了闲,还要自己喜欢,并且坚持。因为在今天,文学翻译对译者而言,多半是个寂寞,吃力又不见得讨好的苦差事,对象高校这样的教学科研单位而言,翻译得不到重视,不算科研成果,挣不到“工分”。译者和译者、和外界的交流不多,不像梁宗岱先生那个年代,译者和译者、译者和作家、译者和艺术家之间交往很多。我们在梁老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写给徐志摩、梁实秋、李健吾、梵乐希、罗曼·罗兰、刘海粟、朱光潜等人的信,俨然各大大门派华山论剑的架势。话说回来,外国文学翻译不算科研成果是件很荒唐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翻译出版市场的外国文学翻译无以为继,如果没有保质保量的当代外国文学适时有序地补充到中国知识界的阅读视野中,外国文学研究将何去何从?如果学术界重研究轻翻译的风气不及时扭转,如果出版界不改变翻译工作强度大、报酬低的现状,那么别说外国文学佳作的翻译质量得不到保障,恐怕好译者很快都要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了。

两年前寒冬的一天,同事告诉我叶涓渠先生已经离世,还说了为不惊动大家,叶先生家人已经低调办完丧事。我一下愣住了——我在不久前还同晓莘去看望过叶先生和唐老师——许久才回过神来,赶紧给晓莘打电话。答案是肯定的。后来,只依稀记得,我含着泪水,打上的士,急急忙忙赶往花店,选上一束鲜花,来到叶先生家。这回,来开门的是唐月梅老师。望着悲恸之中的唐老师,我明白,叶先生再也不会来开门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秋日,《世界文学》编辑部组织秋游,地点是香山。春游或秋游是《世界文学》的传统活动,每回都能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记。那次秋游是我印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时任《世界文学》主编的李文俊先生特意嘱咐大家携家属同游。为此,特意让院里安排了一辆大巴。我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赶上大巴,自己坐火车赶到香山与大家会合。

正是在香山一片草坪旁,我第一次见到了叶涓渠先生。他同编辑部前辈唐月梅老师是外国文学界有名的学者伉俪。叶先生个子不高,略显瘦弱,却十分精神、清爽,有一种特别的儒雅气质,同时又给人极为亲切的感觉。见到叶先生,我有点喜出望外。我知道叶先生是研究川端康成的专家、日本文学权威学者,著译等身,在外国文学界享有盛誉。我读过的不少川端康成的作品都是叶先生翻译的。几乎没有任何寒暄,我就站在路边,向叶先生表达了我的敬意,并谈起了阅读川端康成作品的点滴感受。川端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仿佛某种忧伤和凄美的混合体,来自心灵,又直抵心灵,因而也就格外迷人。而叶先生将那种韵味传达得准确极了,即便不懂日文,也完全能感受到。我提到了《雪国》,特意谈到其中一个难忘的细节:火车上,岛村无意识地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划出道时,忽然清晰地看到一只女人的眼睛。第一瞬间,他以为那是自己正思念着的远方的女人。可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那是坐在斜对面的姑娘的眼睛映在了玻璃上。多么精妙的细节!我这么说着,有点激动,就像一个学生在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叶先生专注地听着,笑眯眯的样子,随后同样有点激动地说道:“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个细节。你喜欢川端,真是太好了!”

几天后上班时,唐月梅老师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两本《川端康成作品集》,扉页上是叶先生清秀的签字。我顿时感到一阵惊喜和感动。

二

很长一段时间,叶先生和唐老师居住在农展馆附近一幢六层居民楼里。那幢楼十分普通、简朴,显得有点灰暗,没有电梯。第一次拜访叶先生和唐老师,我发现他们住在六楼,惊讶不已。两位大学者、翻译家都已年过六旬,竟然住在没有电梯的顶层,上楼下楼,那么费劲,多不方便。叶先生和唐老师常爬一层,歇一下,再接着爬,进到家门,已气喘吁吁。我爬过几回,都有点吃不消。叶老师苦笑着说:“这就是让我们学者享受到的待遇。”接着,叶先生又黑色幽默了一把:“这倒也好,天天逼着我们锻炼身体,省得去爬山了。”我意识到,叶先生所说的这一现象,在我们国家的许多科研单位普遍存在,何止才能真正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难怪有不少学者都不愿再做学问,而是去追求权力、金钱和利益,而且这种现象在近些年居然越演越烈,哀哉!

叶先生家是三居,门厅极小,大屋用来做书房,放上书柜和书桌,基本上就没什么空间了。唐老师只好在卧室读书写字做学问。小屋就用来会客。这可能是我见到的最冷清仄仄的会客室。见一两个人,还勉强凑合,多了就太拥挤和局促了。就在那名副其实的陋室里,叶先生和唐老师完成了一部部著作和译作,令人敬佩。我们每次到访,叶先生都会特别开心,先让我们到小屋坐下,再沏上咖啡,然后便是我最期盼的情景:叶先生到书房,取来几本新作,签字盖印,笑眯眯地递到我们手里,仿佛送上见面礼。这可是世上最美好最珍贵的见面礼。时间流逝,每每想起叶先生,我总会首先想到这一情景,那么的亲切、温馨,洋溢着浓郁的书香和真挚的情谊。

三

久而久之,我的书柜里积累了一大摞叶先生和唐老师的赠书:《樱园拾叶》《扶桑琐瑣》《雪国的诱惑》《周游织梦》《浮华世家》《白色巨塔》以及三卷本的《安部公房文集》,十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四卷本《日本文学史》,十一卷本《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每每看到这些著作、译著和编著,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即浮现出两位长者伏案劳作的情形。叶先生和唐老师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不会享清福的学者”。印象中,他们总在劳作,一刻也不停歇。他们不抽烟,不嗜酒,不喜欢交际和应酬,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著书立说。能够安安静静做点学问,于他们,便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意义,他们乐在其中。然而,有时,安安静静做点学问,竟也成了一种奢望。

不得不说说三岛由纪夫研讨会。我也算半个亲历者。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学中的“怪鸟鬼才”。但由于其右翼思想,在我国曾被简单地定义为“军国主义作家”,长期成为学术禁区。这显然有违于学术规律。叶先生认为:“三岛由纪夫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是属于右翼的,他的文学结构是重层而极其特异的,都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包括否定的地方,因此从整体上辨析‘三岛由纪夫现象’就更显得有其必要了。”基于这一学术认知,叶先生和唐老师开始主编规模庞大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对于三岛由纪夫研究,这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95年,《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日本文学界几位学人觉得有必要组织一次三岛由纪夫研讨会,确定在武汉大学举办。那年9月,我赴美深造,没能去往武汉。但后来传来的消息却让我震惊:研讨会就要召开前,因某些原因被迫取消,已经印好的十一卷本《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只能存放在库房里。远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可以想象叶先生和唐老师的郁闷和无奈。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于可以读到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作品,也终于能够深入地探讨三岛由纪夫现象了。这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四

2008年左右,叶先生和唐老师终于告别“蜗居”,搬进了几乎用一生的积蓄购得的新房。房子宽敞明亮,环境也十分幽静。这回,两位已近八旬的老人总该好好歇歇,颐养天年了。尤其是叶先生,几年前曾在美国得过严重的心脏病,幸亏抢救及时,才闯过了一道鬼门关。我们都特别担心他的身体,希望他能放弃劳作,过上轻松安逸的生活。但是没有。新居里又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书柜。落地窗旁,又整整齐齐地放上了两张书桌。终于有一个像样的书房了。有这样的书房,就更得出成果了。叶先生如此想着,身体稍稍恢复,就又投入了学术劳作。这已是一种惯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学术劳作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又让他怎能割弃呢。

我和晓莘曾多次去过他们的新居。我们总是门访时,叶先生和唐老师总是能放松放松,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每回,叶先生都聊得特别兴奋,谈他的著述计划、读书心得、科研项目,谈着谈着就到了饭点。每回,叶先生和唐老师都绝对要留我们吃饭。他们都是广东人,看重美食。在叶先生家吃饭,不仅享受美食,更享受温馨的气氛。我们还一道出去吃过饭,那有点像过节。叶先生和唐老师总是能找到好吃的粤菜,真是神了。记得那回,叶先生再发大病初愈,已安上心脏起搏器,身体明显虚弱,只能轻声说话。我们怕累着叶先生,编了个理由没有留下吃饭。望着羸弱的叶先生,我想,等叶先生完全康复后,一定要请叶先生和唐老师好好吃顿饭,就吃好吃的粤菜。但时间残酷,叶先生最终没给我这样的机会……

叶先生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又容易激动,常常像个率真的老顽童。这样的个性容易得罪人,而我恰恰就喜欢叶先生的率真。文人怎能没有个性?学者自然要靠学术成就说话。叶先生和唐老师几十卷的著作、译作和编著,都是一个字一个词琢磨出来的,这是世上最诚实最神圣最令人尊敬的劳作。如此丰硕的成就,凝聚着多少心血、才华和神思。这些学术成就明白地摆在那里呢,叶先生和唐老师都是真正的学者和文人。

罗马尼亚人称作家为不朽者。叶先生写了这么多书,该是名符其实的不朽者了。想着这些,我又一次走到书柜旁,又一次捧起叶先生的书,我在心里轻声地说道:有些人,永远不会离去……